

鍾賢培 汪松濤主編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廣東近代 文學史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卢钟鹤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
李兰芳 陈越平 林 若 黄文俞 黄华华
谢 非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黄 浩

主 编：于幼军

副 主 编：刘斯奋 岑 桑（执行） 萧如川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卞恩才	冯伯秋	庄 昭
刘扳盛	刘斯奋	朱仲南	李权时
岑 桑	张 磊	陈俊年	陈胜彝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萧如川	曾牧野	曾宪志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

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目 录

第一章 广东近代社会与广东近代文学	1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焦点与文化观念的 蜕变	2
第二节 文化观念蜕变对广东近代文学 的影响	21
第二章 广东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38
第一节 广东近代文学思想与中国近代 文学革新运动	38
第二节 广东近代文学的特点	51
第三节 广东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59
第三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上）	67
第一节 概说	67
第二节 洪秀全、洪仁玕的诗	69
第三节 爱国诗人张维屏	74
第四节 “粤东三家”沈世良、叶衍兰、 汪琬	86
第五节 黄培芳的诗论及诗作	103

第四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下）	120
第一节 陈澧的诗词	120
第二节 梁廷枏及其《藤花亭曲话》	133
第三节 谭莹、谭宗浚的诗文	143
第四节 招子庸、彭泰来、何曰愈的诗	162
第五节 “琼籍诗人” 张岳崧、韩锦云	177
第五章 维新变政时期的文学（上）	190
第一节 概说	190
第二节 “诗界革命” 的旗帜黄遵宪	195
第三节 爱国诗人丘逢甲	225
第四节 “客籍诗人” ——丁日昌、何如璋、胡曦、 丁惠康、范萸香、叶璧华	240
第五节 梁鼎芬、曾习经、罗惇縵的诗词	271
第六章 维新变政时期的文学（下）	292
第一节 政治改革家康有为的诗文	292
第二节 “文坛巨子” 梁启超	310
第三节 康门弟子的诗文	330
第四节 潘飞声的诗文	340
第五节 郑观应、冯骥声的诗文	348
第六节 新体小说的代表作家吴趼人	366
第七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382
第一节 概说	382
第二节 苏曼殊及其创作	388

第三节	黄节的诗与陈洵的词·····	409
第四节	广东南社诗人蔡哲夫、马骏声、邓尔雅·····	425
第五节	革命派小说家黄世仲、梁纪佩·····	433
第六节	革命党人的诗文·····	446
第八章	广东近代地方戏曲·····	471
第一节	概说·····	471
第二节	粤剧·····	485
第三节	潮剧·····	497
第四节	琼剧·····	506
第五节	广东汉剧·····	514
第九章	近代民间文学·····	522
第一节	民间歌谣·····	523
第二节	民间故事传说·····	544
编后语·····		570

第一章 广东近代社会与 广东近代文学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北负五岭，南濒大洋，人杰地灵，物产丰阜。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发较晚，直至明代，仍被视为蛮烟瘴疠之区，官宦谪逐之所。在文化方面，虽然岭南文化早在 2000 多年前即已纳入中华大文化的体系，接受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初唐时期，广东新州（今广东新兴）出了个惠能，主张净心和顿悟，不执著于文字，不执著于法相，创立了带有玄学色彩的佛教南宗禅宗，后来发展成为全国佛教教派中最有感召力的一宗，对中国哲学的演进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明代，广东新会又出了个陈献章，人称白沙先生，倡导“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主张读书习静，以保心体之灵明，以养心境之澄清，进而以直觉直叩自然之本原，领悟宇宙之真理。在晦翁学派已成官学，传统因袭，几近靡靡；朱陆二派相互诟，各辩是非，传统主义和正统思想弥漫的明代中

叶学术界，独树一帜，其影响及于全国。但是，从总体而言，无论是学术文化或者文学，近代以前岭南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仍然处在比较落后的地位，极少产生全局的影响。

迄于晚清，这种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岭南思想文化一改往昔似乎无大作为的面貌，而肩负起全局的使命。挟时代之风雷，占岭海之地利，扬传统之精神，广东近代文学也揭开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第一节 社会矛盾的焦点与文化观念的蜕变

19 世纪前半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以英、法为例：英国的经济，由 20 年代的复苏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更快。1820 年至 1825 年，英国生铁的产量增长了 58%；同期，英国商品输出年总值由 4800 万镑增至 5600 万镑。法国则在“七月王朝”时期工业革命得到迅速发展。1830 年至 1847 年，工商业总投资由 300 亿法郎增至 450 亿法郎；铁路里程由 30 余公里激增至 1500 公里；对外贸易总值则由每年 11.31 亿法郎增加至 24.3 亿法郎。新兴资本主义世界急剧膨胀的社会生产力，一方面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同时也刺激了列强的掠夺性。英、法等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向落后地区掠夺原料产地、人力资源和商品倾销市场的侵略狂潮。仅就亚洲地区而言，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就先后沦

为英、法、俄、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当世界资本主义因工业革命的推动而取得长足进步，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潮水汹涌东进的时候，中国则仍然处于几乎与世隔绝，十分保守和落后的封建衰世，统治者还在作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在经济方面，早在明代中叶即已出现于中国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若干城市的某些手工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如陶瓷、丝织、造纸、铸冶、制糖等手工行业的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手工工场），虽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极其缓慢的发展，终于未能成长为足以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独立力量。如马克思所云：在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的”^[1]。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仍然是传统的男耕女织。英人密切尔 1852 年在给他的上级的报告中，详细叙述过广州农村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情况：“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都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一种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至于自用而有馀，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中国每个小康之家都有织布机，……福建的农夫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2]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手工业中也仍然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依旧只是少量地存在于沿海沿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较为发达的手工行业，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

不仅如此，由于乾、嘉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可耕地大量集中于皇室贵胄、八旗兵丁及缙绅豪强之手，广大的自耕农纷纷沦为佃耕之户。乾隆十二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云：“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3]佃户要承担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的地租，“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4]。此外，还要负担繁重的赋税和劳役，人丁税、火耗银、粮耗银，“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5]。然而，仅仅地租、赋税、劳役还不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民所受剥削的全部，由于清代许多赋税改为征银，农民还要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农民的生计，越发难以维持。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下，农民破产，大部分沦为雇工，一部分则离乡背井到边外垦殖，一部分则成为流民，四处流徙，一部分则冒死出洋，到海外谋生。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广大农村的封建经济实际上濒临破产。加上吏治的极端败坏，官吏豪绅相互勾结，巧取豪夺，聚敛财富，骄奢淫逸，荒纵无度，社会暗无天日，而广大的贫苦百姓则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前，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前仆后继。较大规模者，有1796年至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和1813年的天理教起义。白莲教起义以湖北为中心，后来发展到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前后历时9年。以木匠李文成、药店学徒林清为首的天理教起义，曾一度攻入北京皇宫。天理教的起

义，反映出除了农民的起义斗争之外，同样走投无路的手工业工人和城市下层市民也走进了向封建统治者讨回公理的斗争行列，反映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化。

与全国的总形势一样，鸦片战争前的广东，同样是吏治腐败，农村凋敝，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社会危机深重。嘉庆间，广东巡抚百龄，上任不及一年，即兼并土地 5000 余亩。上行下效，州县官吏贪污腐败，贿赂公行。1835 年 6 月《中国丛报》引用东印度公司某职员对广州官员的评语云：“老实说，广州政府的官吏，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当非过甚之词。农户不堪负荷，纷纷逃亡。仁化县自嘉庆元年至二十一年间，共欠田赋银 2.64 万两，其中逃亡户占五分之一。一部分人无地立锥，只得远涉重洋，谋生海外。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给朝廷的奏折中，就写到澳门的一些无业贫民，“受雇出洋，……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作粗重活计”^[6]。“1804 年，庇能（檳榔嶼）总督乘当地华侨甲必丹定官回华的机会，委托他在广东招雇华工，……以后的十多年中，不断有成批的契约华工，或五六百人，或一千人，从澳门偷运出口。”^[7]除了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外，鸦片战争之前的广东民众，还要身受烟毒泛滥以及由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之害。19 世纪初，白银一两只换铜钱千文，而到 1839 年，一两白银，可换铜钱 1678 文，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得钱，而交纳赋税则需折算为银两，负担大为加重。为了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嘉庆七年，归善县（今惠

阳县)县民陈亚本发起组织天地会,结纳会众万余人,以博罗县羊屎山为营地,发动了嘉、道年间广东天地会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道光九年至十一年,海南崖州洋琳峒的黎族起义,令清廷“俶扰三载,靡饷亿万”^[8]。道光十一年,湘粤桂边的瑶民大起义,更使清廷朝野震撼。

不仅如此,由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方面的某些特性和特殊地位,当西方列强向中国伸出侵略魔爪之时,广东就成为列强侵华的首选之地。

广东位于祖国东南沿海,有长达 4300 多公里的海岸线,沿海多天然良港,辽阔的南海上广布大小岛屿和礁滩。北部山地为南岭之一部;西南则为山地、台地,海拔在 1000 米左右;向南则为花岗岩风化残丘,至沿海逐渐降低为以石英质砂粒为主的沙荒地。在上述三部分山地丘陵之间,珠江三角洲平原和韩江平原,土壤肥沃,河网纵横,岗峦错落。加之广东全境地处亚热带、热带,大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古有“南中草菜,经冬不衰”^[9]之说。汉代时,广州已经种植双季稻,明代中叶之后,在珠江三角洲和韩江平原的广泛区域已经形成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

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广东经济很早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广东的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比例向来很大,而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则反而较小,正如张维屏所云:“东米不足,西米济之,西米不足,洋米济之。”^[10]明、清两代,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形高潮。这种以经济作

物为主的农业，具有浓厚的商品农业性质，势必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据史载，明代时，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的产品，种类颇多，主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席草、藤、桑蚕、塘鱼、茶叶、苧麻、棉花、蔬菜等，明中叶之后，又从国外引种了烟草和花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明代广东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广东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随之。”^[11]清人张渠在《粤东闻见录》中亦有同样的记载：“近省数大县逐末者多，务农者少，即有肥美之田，多种荔枝、龙眼、蒲葵之属。”明代中后期，出现了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的耕作制度，构成种桑养蚕、种果、养鱼这种科学的自然生态农业，进一步加速了广东农业的商品性生产，产品不仅种类多，而且生产规模大，逐渐形成大小不等的农业商品生产的专业区，涌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某项农业商品生产的专业农户，如“龙荔之民”、“鱼花户”、“花农”、“菜农”等等。商品农业的发展，为手工工业及相应的加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因而又刺激了手工工业的发展。明代，广东以石湾为代表的陶瓷业已有“甲天下”的美誉，石湾的陶瓷产品不仅畅销两广，而且远销海外。缫丝业与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棉麻织业也相当发达，《天工

开物》就有“广东为布薮”的记载。其他如榨糖业、制葵业、制席业、造船业、制盐业、铸冶业、采珠业等，均在国内外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由于广东农业的这种特性和随之而来的加工业及手工工业的发达，广东经济的第二个鲜明特征就是商品经济起步较早，广东很早就成为国内的商贸大省，商品的集散地，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自汉代以来，广东的徐闻、合浦就是对外交通的重要门户，《汉书·地理志》末附“南海航路”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

六朝时，广州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口岸东移的原因，一是由于海上航路由于交趾，日南遭到此时强大起来的林邑国^[12]的破坏，北部湾航线并不安全，因而海上航路改经海南岛东部海岸；二是由于广州处三江合汇之处，南出大海更为便捷，且北有陆路可通中原，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粤东航线的开辟，使广州的对外交往更为频繁。南朝时，由印度及东南亚诸国来广州的使舶和进港贸易的商舶数量大增，广州开始成为中国与南洋交通的门户。唐代之时，到广州进行贸易的有波斯、大食、天竺及南海诸国。每年夏天，各国商舶乘东南季风而至。而中国的远

洋商船亦由广州，顺海南岛东海岸，越西沙群岛，穿麻六甲海峡，过斯里兰卡、印度而抵阿拉伯重镇末罗^[13]，又经阿拉伯半岛东部、南部海岸而至东非海岸，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海上丝路”。广州亦由此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珠江河面呈现出一派“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14]的繁荣景象。虽然唐代末年，广州的对外贸易一度衰落，但这种情况，宋初即得到扭转。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在广州专置提举市舶司，以专“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15]。南宋末年，广州在对外贸易方面开始落后于泉州，但广州在元代7个建置提举市舶司的沿海城市中也是仅居泉州之后，其东方商贸大港的地位并无改变。顺帝时来华游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在其《游记》中这样描述他对广州的印象：“秦克兰（广州）者，世界大城市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16]明初，朝廷屡施海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更明令“严禁广东通番”^[17]。但是，广东民间的海外贸易并未中断，沿海地区违禁下海者不乏其人，甚至地方官吏也“私造大舶，以通番商”^[18]，远达东西二洋。至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为形势所迫，终于开放海禁。海禁一开，通海者“十倍于昔”，部分广东商人甚至在东南亚各国定居，而成为华侨。清初，统治者为了切断海上抗清武装的供应来源，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重新颁布禁海令，严禁沿海各省商民船只出海贸易，同时严禁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不许片帆入口”^[19]。顺治十八年（1661年）甚至发布“迁

界令”，勒令沿海居民内迁 50 里，在沿海地区造成 50 里的无人地带。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 年），清廷宣布开放海禁，旋即下令开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但对外贸易仍然采取许多限制。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为防止外船北上，清廷又宣布封闭闽、浙、江苏三关，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从此，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运至广州的出口货物多达 80 余种，其中以茶、丝、瓷器、土布、药材为大宗。世界各国来华商船云集于此。

但是，广东虽然有长期的对外交往历史，地理位置亦较为优越，但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也与内地一样日益加剧，而且成为外国列强侵华的第一个目标与突破口。

总而言之，无论是全国还是广东，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危机极端严重，用龚自珍的形象说法，是“弹丸累到十枚时”^[20]。外部是列强环伺，磨牙涎舌；内部是腐败孱弱，矛盾重重，千疮百孔。如此广泛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改朝换代所能克服，中国的封建社会确实已是油干灯尽了。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之下，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已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终于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号称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英国，在经过长期的试探和准备之后，终于向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盈、有着广大市场和丰富的廉价劳力与原料而内部又腐败落后孱弱不堪的东